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历史学（第二辑）

社会进化史

[德] F. Müller-Lyer 著 陶孟和 沈怡 梁纶才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历史学（第二辑）

社会进化史

〔德〕F. Müller-Lyer 著 陶孟和 沈怡 梁纶才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进化史/(德) 莱尔著;陶孟和,沈怡,梁纶才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历史学)

ISBN 978-7-5520-1275-0

I. ①社… II. ①莱… ②陶… ③沈… ④梁… III. ①社会发展史 IV. ①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1917号

社会进化史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26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0-1275-0/K.325

定 价: 120.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一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三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治体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来，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德] F. Müller-Lyer 著 陶孟和 沈怡 梁綸才 譯

社會進化史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初版

序

向來關於社會的論著大概多屬於哲學的著作。著者所根據的事實很少，專從理論的立足點討論關於社會的原理原則，或研究關於社會的抽象的觀念，或用哲學的眼光解決現代的社會問題。自柏拉圖的共和國乃至英國馬肯西（J. S. Mackenzie）現在已經絕版的社會哲學緒論一切關於社會的著作大概都是這一類。

但是要使社會的研究成為科學的，就不能不脫離了以先哲學的科臼。抽象的哲學的推論誠然有時可以供給我們許多的提示，產出良好的結果，有時可以提出合理的臆說，指導後來的研究，但是真正的科學不能只建設在抽象的推理上的。無論理性是如何『純粹的』，如果沒有事實，如果對於事實沒有系統的研究，那理性終久不能產出科學的。近代社會學者都已注重事實。事實固然是社會科學的基本原料，但是研究起來也不是容易的。近來古生物學，人類學，言語學，歷史學，經濟學及其他輔助科學進步極速，所供給的研究資料甚多，要整理，排列，捨輕，取重，從夥多的紛雜的事實之中，攝取精要的，確是極困難的。社會學所包括的範圍極廣闊，所牽涉的關係極複雜，所以就是已經有了許多的

事實，有時仍然嫌不足，所需要的事實偏偏不齊備。所以社會學者要在這個情形之下構成一個有系統的科學，恐怕有很少敢輕於嘗試的。

社會學者的大部分因為全體的綜合的研究，差不多是茫無頭緒的，所以都專從事研究一個民族或一個題目。結果，社會的研究變為極專門的，而所謂社會學的本身反倒沒有成立。我們試翻閱現在社會學一類的書籍，除了無數簡陋的，散漫的，淺薄的，教科書以外，大部分都是些社會學或人類學的專著。這些專著固然是很有價值的，是社會學的基礎，但不能稱為社會學。

現在社會學上最主要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社會的性質，社會的演化，文化演進一般的趨向，社會進步與社會退步諸問題，這些問題，固然不是純粹哲學的討論所能答復，卻也不是那些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專著所能解釋闡明的。要答復這些重要問題，必須藉各種研究與各種輔助科學所供給的材料構成社會發展的全景，尋出社會進化的系統。這就是歸納的社會學，這就是現代社會學上最重要的事業。現代社會學所以能成立的理由，就是因為可以根據社會現象與社會事實用歸納的方法以追溯社會進化的次第，顯

出進化的線索，指示將來進化的傾向與目的。現在我所要介紹的著作，就是這一類的歸納的社會學。

本書所採用的研究法，就是自然科學上所用的比較法，但是著者稱他爲變象的研究法 (Phaseological method)。按這個方法先將文化的全範圍分爲若干部分，然後再將各部分自最古以至現代所經由的途徑分別排列爲若干變象 (Phases) 或階級。我們如果將各不同的變象互相比較，就可以發見這些變象的演化都是有一定的方向的。這個方向可以稱爲『進步的趨向』(die Richtungslinien des Fortschritts, the lines of direction of progress)。

發見這些進步的趨向，不特有學術上的趣味，並且是現代社會生活上最迫切的問題。我們人類已經有了幾十萬的生命，我們在這個長久的年代之中已經造出極複雜的極高尚的文化，從禽獸般的小的遊羣已進到龐大的國民，更進而爲國際的大團體，從不知取火，不知耕種的生活已進到能支配一切自然力與物質的境界，從鳥鳴獸吼般的言語已進到能用文章發表極深邃的思想極濃厚的情感階級。這樣可驚的變化到底有

什麼意義，到底有沒有一定的系統，到底還要發生什麼變化，到底向什麼方向行去，這些都是最迫切的問題，不得不急謀解決的。而研究文化進步的趨向，正可以幫着我們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用變象的研究法尋出了進步的趨向，第一，可以知道人類過去的發展是進步的，有一定的方向的，有一定的規律的，並不是偶然的，無定的。從此可以看出過去文化進行的趨向。第二，我們可以對於現在有一個新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出現在的文化並不是絕境，並不是最高點，我們的社會並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境界，現在的狀況不過是無窮的發展程序中的一節。第三，進步的方向可以指出將來的目標。我們研究現在的社會現象尋出他的原因了以後，才可以發見那支配社會現象的定律，從此也就可以推測那些現象的前途。這樣的推測，雖然不能說有十二分的把握，但是至少可以指示進化的傾向與進化的目標。這些都是社會學上最主要的問題，可以用歸納法，比較法，即著者所謂變象的研究法闡明的。

著者所抱的計畫頗大。他擬出要著述的歸納的社會學共十二冊。全書總名為『人

類進化之階級，『據著者自述這十二冊包括純粹『純粹社會學』的全部。此外關於應用社會學的計畫尙未宣布。不幸著者於一九一八年逝去，除應用社會學的著作一部外，他所計畫的純粹社會學只有七冊出版。茲將已出版的各冊名稱列出，以便略窺著者計畫的大概：

一、生命與科學之意義——民族哲學的基礎線索 一冊

二、文化的變象與進步的趨向 一冊

三、婚姻與家族的模式 一冊

四、家族 一冊

五、戀愛的變象研究——性別關係的社會學 一冊

六、優生學——選種，教育，遺傳的社會學 兩冊

七、苦痛社會學（應用社會學之一） 一冊

本書的原稿就是上列的第二種，現在改名爲『社會進化史』。此書出版於一九〇八年，我在十三年前最初研究社會學的時候，哈蒲浩教授就舉出這本書做參考。歸國以後

常想將原書譯出，但是因爲譯述德文太覺吃力，所以始終未敢動筆，但是在學校講授社會學的時候，常引用他的材料與論斷，得力於這本著作的不少。前年沈怡與梁綸才兩君答應分別擔任譯述這本三百六十頁的大著作，以後沈君赴德留學，梁君又以故未能繼續譯事，我覺得這個未竟的譯事若竟放棄，未免可惜，於是我又自己動筆，將第三卷第四章以後翻譯完畢。幸而此書現在已譯成英文，（英文本改名爲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譯者爲雷克女士的母女二人，雷克女士也是與我在十三年前同班受業於哈清浩教授的），我按英文本翻譯，省了許多的時間與精力遇有難解的地方，我才對照原本，檢查他的真意義。

德文原書在一九一五年再版，畧有改竄的地方。我因爲手下沒有新版，所有翻譯校閱都按第一版原書。

陶孟和十二，九，一，北京。

著者原序（著作的趣意與計畫）

人類從渺茫的起源經過非常久遠的時期，才進到現在的地位，這是人所共知的。人類最初都是些散居在深林中的小羣，與野獸無異。以後由小羣聯合成爲部落，部落成爲國民，國民成爲國家，國家又成爲強權，到了今日，差不多世上所有的人民都藉着貿易相結合成爲一個大的工作團體。人類一步一步的趨於組織更高的團體，前一代總是做後一代的先導，文化的成績竟積成爲大產業。人類創造言語爲文化最重要的媒介，發明工具，舉火，以後又發明耕種與畜牧，採取金屬。人類又發展了宗教，藝術，科學，造出各種巧妙的機械，更漸漸會支配自然的勢力。

所謂文化就是人類這樣的偉大變遷的程序，但是人類對於這個大變遷所經行的途徑的一大部分，却是絲毫沒有覺察的。因爲這個變遷太大，所以有許多大的事業，他的狹窄的眼光都沒有看出。他沒有看出文化的緩慢的進步，正如同他在地上居住的地方沒有看出那繞日的大運行的一樣。

正在人類史上最重要的一幕，正在人類文化的發展進到自覺的境界的時候，發生